

第十二讲 文化交汇下的中学与西学之争

——以陈兰彬、容闳和留美幼童为中心

1881年6月8日，清廷下令全部撤回留美幼童，经营了大约10年的出洋肄业局尚未完成它的使命，就在国内保守派的批评指责下夭折了。对于中道撤回留美幼童，包括容闳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主要是陈兰彬之过。容闳就说：“陈的决定是：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时间已经够长，理应撤回。”^① 郑观应等洋务分子因此亦对陈兰彬等破坏留美事业极为不满，在《赠美国肄业诸生并容沅浦、邝容阶两教习》中郑观应写道：“文章机杼自专家，译象千言点不加。爱国无殊林友植，上书共比贾长沙。诸生游学将成业，公使何因促返槎。翻羡东瀛佳子弟，日新月盛愧吾华。”^② 并认为：“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名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日本肄业英、美、德、俄之学生，至今尚络绎不绝。”^③ 这种对留美幼童中途全数撤回的惋惜和对陈兰彬等力主全数撤回留美幼童言行的指责，使为

① 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8—119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4—1255页。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5页。

曾国藩看好的“具有任重致远之志”、“熟悉夷情”的翰林陈兰彬，一直被视为负面的“保守派”代表人物。

这种对陈兰彬“负面形象”的界定，直接导致后世对陈兰彬其人其事的研究和评价。如石霓在《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一书里，就认为陈兰彬从一开始就以敌视的态度对待留美幼童。^① 黄晓东、刘中国在《容闳传》中也指出陈兰彬、吴子登（嘉善）与国内守旧势力遥相呼应，紧紧抓住时机，将出洋肄业局所谓“流弊”上奏朝廷，坚决要求予以裁撤，并认为他们的言行不仅加速了清政府撤销肄业局的速度，而且成为清政府撤回留美幼童的决定性因素。^② 但梁碧莹教授根据她新近发现的材料考证，认为尽管陈兰彬、容闳两人在对留美幼童的目的的看法和管理上存在着矛盾，但陈兰彬并未由此萌发撤回幼童的想法，真正首先提出撤回留学生的是吴嘉善（子登），而不是陈兰彬。^③

这里姑且不论陈兰彬是否是撤回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仅从其与容闳在留美幼童以学“中”为主还是以学“西”为重的分歧和争论上，就可以想象到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人的人才观、文化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何状况，就可以窥测到留美幼童全数撤回和出洋肄业局裁撤背后复杂的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原因，甚至因此对陈兰彬与容闳的矛盾分歧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一、缘起与初衷上的默契

近代中国官费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与容闳的孜孜以求、丁日

① 参见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3 页。

② 参见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珠海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8—349 页。

③ 参见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9 页。

昌的引荐、曾国藩的首肯和李鸿章的支持有关。而丁日昌、曾国藩和李鸿章对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持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又与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器练兵”、自强求富的洋务思潮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派遣留学生已成为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容闳个人努力则成为强力催化剂，大大缩短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进程”。^①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血与火的冲击后，清政府中的明智官员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深切地感到无论是制器练兵还是对外交涉，都离不开西学人才。李鸿章就深有感触地说：“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先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② 并认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③ 而“尤以人才为急要”。^④ 奕訢也指出：“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补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⑤ 不过，最早提出派遣留学生想法的是一位名叫桂文灿的位卑职低的小官，他于1863年奏陈：“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

① 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②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页。

③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国史本传，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3页。

④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

⑤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奕訢等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

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引之。纵不必遣人远到外国，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① 奕訢对此甚表赞同，并强调指出：“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只是“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而且“尚未尽合机宜”。^② 1865年，李鸿章在与奕訢密商派旗兵赴外国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之事时，也再次表示派人出国学习，“以理与势观之，亦为将来必有之举，鸿章盖尝默存此见未敢倡为是论”，“窃谓此事若行，似不至于流弊之太多”。^③ 曾国藩甚至明确指出：“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④

由此可见，向清政府提出派遣留学生这一想法的，在容闳之前已有多人，但具体建议向美国派遣留美学生的应该是香山人容闳。尤其是容闳率先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的建议和“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次，每年选派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皆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

①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第32页。

②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第32页。

③ 《李鸿章致总署函》，载《海防档·机器局》（二），台湾“中研院”研究所1957年版，第13页。

④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西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页。

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监督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①的具体办法，不仅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的意图相吻合，而且也在根本上解除了他们在“选材”和“筹费”上的困难和顾虑。事实上，也正是容闳的周密计划和颇具操作性的建议，打消了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官僚的顾虑，坚定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决心。

尽管当时从事洋务的中国人相信西学教育的优越性，看到西学教育更能使人学到真实功夫，如祁兆熙在他的《游美洲日记》中就认为：“中土庠序之设，惜少真实功夫。西法：子弟六七岁入小学，犹中土读四书也；十岁后开经书，换一大学堂，至舞象之年，譬之中土开笔之时，期间本人愿习何事。于是，读书、兵法、机器、贸易等，各分门类，各立大书院。送进再学几年，自然成就，法尽善已。”^②但也有不少人担心幼童出洋留学，容易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被彻底西化，变成“非中国人”或“非文明人”。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的初衷也是为了学习西方的“技艺”，即有用之学，而非西学的全部。这与容闳在美国学成回国时的想法大致吻合。在自传中，容闳就说：“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奉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雄，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

① 转引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②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28页。

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① 虽然容闳所说的“西方之学术”与清政府及其有识之士所说的“西学”之间在内涵上并非完全一致，但以西方有用之学，尤其是科学技术来补救中国之短，使中国日益趋于文明富强，则应当是彼此之间的共识和心理上的默契。

二、教学与管理上的纷争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在今天并非难事，在当时的中国真是不易。虽然在派遣幼童赴美留学，造就洋务急需人才，增强国家御侮图强的实力等方面，容闳与洋务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有着相同的愿景，但是在关于幼童在美国的教学和管理上，容闳与陈兰彬、吴嘉善之间却产生了不少误解和矛盾，甚至直接影响了留美幼童后来的命运。

选择 12 岁至 16 岁之间的学生赴美留学，在当时极端封闭和相当保守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实在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尽管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制定留学方案时，明确规定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推选聪慧的幼童，但结果首批 30 名幼童还是迟迟未能招满，以致容闳不得不南下香港，在英国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一些学生以足其数。在四批 120 名留美幼童中，广东籍 84 人，江苏籍 21 人，浙江籍 8 人，安徽籍 4 人，福建籍 2 人，山东籍 1 人，其中最大的年龄 16 岁，最小年龄 10 岁，且 11 岁至 14 岁者居多，平均年龄为 12 岁半。在他们看来，年龄愈小，愈容易学习外语及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年龄小出洋留学，不受家庭所累，后顾之忧较少，有益于专心学习，即所谓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 页。

“盖聪颖子弟不可必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①

在留美幼童的学习内容上，曾国藩和李鸿章早在《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中》，就明确指出中学与西学并重：“推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收录入局，由沪局委员会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② 中国驻美出洋肄业局还告谕留学生：“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至洋文汉文，更要融合贯通，方为有用。”^③ 也就是说，留美幼童既要努力学习西文西器西学，又要严格遵守朝廷的定制，勤奋研习汉文汉字中学。但是，1871年4月20日曾国藩在给陈兰彬的信中指出：“幼童赴洋学习须通汉文，阁下定课经史为主，旁及会典律例，求为有用之学，每日习夷技后酉戌之间即礼拜日另为督课汉文，自是善策。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点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④ 这就表明，曾国藩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目的和要求是在国内应先有好的中学基础，出国后只宜专攻

①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

② 《李鸿章全集》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51—852页。

③ 宋晞：《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史略》，载《旅美论丛》，台北国防研究所1965年印行，第36页。

④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362页。

洋学，不能因兼习汉文而荒废西学这个主业。

遗憾的是，无论是陈兰彬、吴嘉善，还是容闳等人，都未能悉心领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时的嘱咐和忠告。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监督，陈兰彬虽然老成端谨，中学较深，“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机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但是一到了美国这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因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难免有些紧张和焦虑。尤其是在临行前，好友薛福成告诫他时所说的“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义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①更令他在美任出洋肄业局监督时，如履薄冰，处处谨小慎微，时时以督促幼童学习中文为要务，事事以中国文化价值标准为依据，训诫幼童不忘根本，既要懂得洋务，熟悉西器西艺，又要效忠皇帝，报效国家。而受过正规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闳，同样“志趣深远”，且“不为习俗所囿”，熟悉和了解西洋文化，懂洋务和外交，到了生活学习多年的美国，自然如鱼得水，再加上亲身经历和清政府的信任，更是春风得意，相信西学才能解中国燃眉之急。因此，他在担任出洋肄业局副局长职务时，于要求幼童学习中文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完成的使命是他们（幼童）将来要学习军事、海军、医学、法律及土木工程，以便进入政府服务时，他们充分具有对化学、物理、地质及天文的知识”。^②而他所要求的学习西器西艺，也符合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初衷，更合曾国藩、李鸿章的心意。1877年第一批幼童

①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② 容闳于1872年2月17日给耶鲁大学校长（Noah Porter）函，未刊稿，转引自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留美五年，即将进入大学学习时，李鸿章就在给区谔良、容闳的信中指示：“近来学生造詣，有储君认真督率，自当进而益上。其选入大书院者，能否会其各习一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既在台湾、湖北等处开煤，所请英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不免观望。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材，望送入矿物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又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①由此可见，在幼童学习的内容和专业方向上，容闳比陈兰彬更能体察曾国藩、李鸿章的真实意图。

尤其是作为正职的陈兰彬重任在肩，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在他的心目中，政治正确和循规蹈矩，也许比方向明确和专业优劣更为重要。因为政治正确就不会因与朝廷背道而驰而获罪，循规蹈矩就不会因离经叛道而遭国人唾骂。因此，在幼童学习的内容上尤其强调“中学”的重要，在生活和言行举止上按中国的规范严格要求，“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见解”。^②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评价标准，自然诱发了陈兰彬与容闳之间的矛盾，凡容闳认为是正当的事情，到了陈兰彬那里一切都目为不正当。如容闳所言：“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

^① 《复区海峰、容纯甫》，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载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是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烦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不无怏怏。虽未至形诸词色，而芥蒂之见，固所不免。”^① 曾任肄业局帮办翻译的黄大权（容闳同学黄胜），陈兰彬“虑及该同知洋习太重，在局究不相宜”，后改派他为金山总领事公署翻译，“以金山相距一万四千里，可免其沾染局事也。”在肄业局里，亦如陈兰彬所言：“各员皆不崇尚洋教，察出各学生弊窦，亦节次撤遣回华，不肯姑息。”^②

对于陈兰彬和容闳二人在留美幼童的教学和管理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李鸿章的态度不太明确，措制也是优柔寡断的。一方面批评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另一方面又认为陈兰彬“对幼童绳之过严，致滋对抗之心”，批评他们不能各执一端，希望他们二人和舟共济，但并没有从思想认识和原则目标上对他们做明确而坚决的指示，结果不但没有让他们在思想认识上达成共识，相反地加深了陈兰彬和容闳之间在教学目标和管理方式上的分歧。而陈兰彬与容闳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恰恰成为留学生提前撤回的诱因。

三、职责与权限上的纠结

本来，容闳是幼童赴美留学的始作俑者，也是最适合的“出洋肄业局”负责人的不二人选，但容闳始终是以“出洋肄业局”的副职在岗任事的。尽管容闳本人并不在意其职务高低和权责多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② 《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国秘国大臣陈兰彬折》，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4页。

少，但清政府在出洋肄业局的人事安排上，并未给首倡者容闳更多的权责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怀疑他的“忠诚”和“热情”。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甚至视容闳为“洋人”。^①

陈兰彬和容闳被委以“选举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李鸿章是这样解释的：“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奏派陈荔秋（兰彬）、容纯甫（闳）为正副总办，盖以容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公也。”^② 在李鸿章看来，容闳固然熟悉洋情，热心洋务，但毕竟缺乏中学的根底，难以为国内多数人接受，“宜得志正体直者赞助，则流弊较少”。^③ 而举荐容闳的丁日昌的解释更道出了真实原因：“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宋旧，以个人身当其中，恐怕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④ 事实上，幼童赴美留学，本身就受到当时一些保守派和清议派的质疑。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从一开始就反对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他说：“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前，陈说利弊，亦与张君之意略同。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⑤ 曾纪泽在当时还算是思想开明、熟悉洋务的先进人士，他

① 1896年光绪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就有“江苏候补容闳，号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

② 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8页。

③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⑤ 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的态度恰恰表明，清政府在“出洋肄业局”的人事安排上表现出的审慎和机巧背后，潜伏着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文化心理上的阻力。

不过，李鸿章深知在办理洋务方面，容闳的才干远远强于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他甚至认为“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① 因此，总理衙门同意曾国藩等人的倡议和出洋肄业局的人事安排，由陈兰彬、容闳分任正、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强调“所选学生，年皆幼稚，自须委员常川约束，在沪挑选，分批送往外洋，亦须有人经理，所有清派委员陈兰彬、容闳、刘翰清等分别常驻美国及在沪设局，互相商办各专责出，应如所议办理”。^② 在奏折中，李鸿章一再强调“所有驻洋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内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③ 安排陈兰彬、容闳为正副使，既赋予出洋肄业局以新的使命，又明确了陈兰彬和容闳各自的职责和权限。

但是，作为正职、负全责的陈兰彬，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没有在权责上根据朝廷定制而自我约束，而是大事小事较少与他的副手容闳等相互沟通，共同协商，不仅偏执地要求幼童学习中学，而且在服装、辫发、信教以及礼俗等问题上过分苛刻。^④ 在制定“留学局谕告”时他就特别强调：“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而尔等终身之计。……但要思出洋

① 《条议三事》，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载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8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

③ 《李鸿章全集》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51页。

④ 参见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200页。

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工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①

作为副职的容闳，在任职出洋肄业局期间，也可谓尽心尽力地督促幼童完成学业，但他过于强调学生要研习西学，了解美国人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对幼童在学习和生活、思想和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也未能根据朝廷定制及时地加以引导和教育，更未主动地与陈兰彬交流和沟通，常常坚持己见，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与陈兰彬相抵牾，甚至认为陈兰彬为人过于圆滑，“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② 在出洋肄业局的去留问题上，容闳又过多地指责陈兰彬，甚至把对吴嘉善的怨气也发泄在陈兰彬身上，认为“陈兰彬仍荐此性情怪僻者以继任，李文忠公亦贸然允陈之请，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吴子登（嘉善）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离经叛道之举”，^③ 并以此认为陈兰彬是留学生被撤回国的罪魁祸首。其实，举荐吴子登的不是陈兰彬，而是容闳。1881年3月29日，李鸿章在给总署的信中就说：“吴乃纯甫所推荐，而荔秋所奏调者也。”^④ 而且容闳认为“其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

① 张海林：《王韬评传附容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① 对陈兰彬在出洋肄业局任上的言行颇不以为然。事实上，陈兰彬在任职期间还是尽职尽责，颇有作为的，并非容闳所言乃平庸之辈。虽然早期在刑部工作平淡无奇，但自从进入曾国藩幕府后，便深得曾国藩的信任和赏识，认为他“胆识俱优”，有“任重致远之志”；李鸿章也说他对时事皆能“洞烛机微”，“有远略而具内心”，薛福成更称其“兼文武才”和“识闷气沉”，有为“中国建无穷之业”的志气和才能。

容闳与陈兰彬在留美幼童是学“中”还是学“西”上相互较劲，并在出洋肄业局裁撤问题上也彼此不能见谅，甚至相互怀疑和指责，究其原因，既与他们在教学目标和管理上持不同的看法有关，也与他们在各自的职责和权限上的自我认识和角色认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容闳声称自己在留美幼童的教学和管理上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因权力有限，不敢固执己见，他说：“此时反对党中有一御史，因美国华工禁约之举，遂乘机上一封奏，请即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以报复美人之恶感。政府阅之，亦未敢贸然准其所奏。乃以此事质之总督李文忠、公使陈兰彬与监督吴子登三人，询其意见。李文忠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陈兰彬因曾任留学生监督，此中真相理应洞彻，故政府亦垂询及之。陈乃以极圆滑之词答政府，谓学生居美已久，在理亦当召回，其措词之妙，可谓至极。吴子登则更无犹豫之词，直接痛快以告政府，谓此等学生当立即撤回，归国后并须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云。此三人各陈所见，初无一语询予。予于此事，已无发言之权。盖彼等咸疑予怀私见，即

^① 李鸿章：《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7页。

有所言，亦不足信也。”^①事实上，李鸿章也并不信任容闳，责备他“勿固执己见”，并在《复陈荔秋星使》一函中表示：“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大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②另一方面，陈兰彬对容闳的偏执也颇有意见而无法隐忍。在与容闳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每有老倦思归之意”，常以“目眇耳鸣，眠食减损”，“言语健忘”，“举止蹇缓，精力有减无增”等“心力不足”而希望“得年富力强之人，肯来经办”，其倦怠之情绪溢于言表，真的没有当初出洋时的那种自信与乐观。

应该说，容闳因过分着意于留美幼童在学业上的西学造诣而宽容或原谅了幼童的西化倾向，这自然与朝廷的定制和陈兰彬的权责发生冲突；而陈兰彬身负重任，却未能正确处理他与容闳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意回避或推卸责任，主观和客观上都辜负了曾国藩、李鸿章对他的期望。容闳也因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和文化上的偏执，使自己苦苦追求的事业在内外纷争的压力下半途而废。

四、文化与个性上的偏执

陈兰彬与容闳二人出任出洋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应该说这是曾国藩、李鸿章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老成端谨，中学较深”的陈兰彬与“熟谙西事，才干较优”的容闳二者的结合，本来可以相互平衡，互相牵制，甚至相得益彰，但事与愿违。其结果是留美幼童中道撤回，出洋肄业局也半途而废，陈兰彬与容闳两人更是不欢而散，容闳本人甚至对陈兰彬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陈兰彬与容闳二人最初接触时彼此都有好感。容闳在天津与陈兰彬见面交谈后，对陈兰彬的印象不错，“我和他素昧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② 《复陈荔秋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载吴汝伦主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1页。

平生，而今后将是推行教育计划的合作者，显然他是乐于离开北京的，他沉抑于刑部主事已二十年，终身未得升迁，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任何成就，更不精于世道。他为人谦恭和蔼，颇有书生气，只是过于谨小慎微，缺乏责任感。”^① 而陈兰彬的好友李兴锐在日记中却认为容闳不如陈兰彬那么好相处。^② 陈兰彬的另一位朋友薛福成也说：“同治十一年春，相国毅勇侯曾公、肃毅侯李公，奏遣刑部主事陈先生兰彬蒞秋率童子若干人，出赴亚墨利加，究习西学，期以十九年旋。先生年已逾艾，毅然无难色。盖先生兼文武才，而识闷气沉，欲为中国建无穷之业，其素志也。”^③ 当时的陈兰彬已是五十六岁的“老人”，洋语洋文一无所知，但他在给朋友李兴锐的信中，仍然表示“弟此行非有所乐而为之，亦非有所有利而为之，第如尝胆枕戈，以期庶几一当”。^④ 事实上，陈兰彬在率幼童出洋的航路上，一直怀揣着激动快乐和热切期待的心情。所谓“翩翩群小尽英髦，域外驰观兴倍豪。须织百般工艺术，根源还在读书高”。就袒露了他对幼童赴美留学的殷切期望。

难得的是，作为翰林出身，长期在刑部任职，又被朝廷委以“出洋肄业局”之正职的陈兰彬，虽然在与容闳共事期间，曾因意见相左而相抵牾，但他在1873年给上海出洋局刘翰清的信中，仍高度评价容闳为创建出洋肄业局所付出的辛劳。他说：“纯翁

① 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3页。

② 参见廖一中、罗真容整理：《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页。

③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④ 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在此料理幼童，稽查洋馆，事事仗其出力，本难分身，兹以去岁奉伯相面谕查化矿变钢卷铁等机器，纯翁到美后，奔走核考，绘图译说，实费数月苦心，而图说仍有未能详尽者，自非亲赉面禀，不克洞达，是以商会暂时回华，禀明公事，即须旋返愈早愈妙，难待第三批幼童结伴同行。”^① 尽管容闳对陈兰彬颇有成见，甚至认为他“圆滑”，“胆小如鼠”，“不敢担丝毫责任”，是“怯懦鄙夫”，但陈兰彬仍能忠于职守，表示“若无接替，亦必法鞠躬尽瘁之义，始终不渝。至于捷径之嘲，谪戍之诮，所谓不入耳之言，早已一笑置之”。^② 虽然他与容闳在留美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等方面持不同意见，但在任何文件和信函中，并没有直接说容闳一个“不”字，表现出一派儒者君子之风。而且还略带欣赏之情，不厌其烦地向朋友介绍容闳“因求熔铸铜铁图说，闻有新式，即趋往观，所画图有未了了者，再三复视，路途来回，动以千百里计。”^③ 又说：“弟于机器虽不甚明了，月来见纯甫所译熔铁变钢等图说，似已得其要领。特利愈大则本愈重，不识能有此力量开办否？纯甫屡谓，以江海地势而论，于江西立局为宜。弟于江西情形向不熟悉，不识品翁在彼能为访察，看有人可任此事否？想中国煤铁同产之地甚多，亦不仅江西也。”^④ 对容闳及其倾心的西学西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没有像容闳所说的那样过于偏狭，于西学持抵触态度。

① 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② 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③ 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页。

④ 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4页。

相对具有二十余年行政经验的翰林陈兰彬而言，容闳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熏陶和行政工作的历练，他满脑子是西洋文化知识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事实，对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官场生态缺乏深入了解和体认。在写给美国卫三畏牧师的信中，容闳认为“中国人充满偏见，他们无法如您或其他开明人士来观察事物，他们反对受教育的好处，他们脑海中满是迷信和无知”。^①因从小就体验到学习西学具有实用性，因此对西方近代文明充满好感，对封建专制和贫穷落后的中国感到忧虑。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回国，希望“以西学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其“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②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西化”了的中国人，尽管他具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和民族精神，然而“一个像他这样的‘西化’的人，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③对此，容闳有自己的看法，在自传中他就表示：“一向被当做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④正是基于文化教育和生活阅历的自信，容闳在为实现幼童留美学习的计划和目标的过程

① 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代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过多地强调了自己目标、方向和方法的正确，忽视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群的巨大存在，有时为达到目的而不计方式方法，不考虑周遭的意见和态度，甚至一意孤行，使气任性，结果与陈兰彬、吴嘉善等正统文人官员之间频发矛盾。就连对他曾有好评的李鸿章也批评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认为他“意见偏执”，劝他“勿固执己见”，并要求陈兰彬“便中劝勉，令其不必多管”，其对容闳的态度可谓又爱又怨，无可奈何。

其实，无论是作为正职的陈兰彬，还是身为副手的容闳，他们都有一颗爱国报国、勇于任事、希望有所作为之心，但是他们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化和个性上的自然印记，更没有意识到对方与自己在文化和个性上的差别。双方在问题的解决和彼此关系的处理上都没有做到“了解之同情”，误会、歧见和矛盾自然难以避免。应该说，文化上的偏见和个性上的缺陷，是陈兰彬、容闳在学“中”和学“西”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留美幼童中道夭折的重要原因。

五、总结与思考下的迷惑

历史往往是喜剧开场而悲剧结尾，又常常是悲剧刚刚落幕而喜剧又重新上演。

近代中国官派幼童赴美留学，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期望和支持下，于1872年率先启动，却在幼童尚未完成全部学业时于1881年全部撤回。有意思的是，事隔10余年后，清政府又再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甚至在清末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历史仿佛就是在这种悲喜剧轮番上演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不管怎么说，晚清留美幼童的命运还是充满了时代的悲剧色彩。但他们最初起航时，个个都满怀希望。遗憾的是，他们最初

的希望来自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就和思想文化的激发，而非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因此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造成留美幼童命运的悲剧性的根源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根源是同一的，就是那数千年不变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①也有学者认为，留学生提前撤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清政府保守势力对新生事物的阻挠和破坏，留美幼童出现的问题，留学事务所内人事的矛盾，美国排华运动的蔓延，以及顽固观念和思想”^②等等，也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容闳出于个人喜好以及职业需要的做法，验证了保守派最坏的偏见。当容闳还在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时，他就皈依了基督教。”后来又于1852年获得美国国籍。1875年，在管理留学事务期间，他与哈特福当地名医之女玛丽·L·克洛结婚。容闳强调西学，忽视中学的做法，引起了官员们的不满。虽然他的目的是想培养孩子们“有广阔视野的国际化世界观”，但这和朝廷培养技术人才，加强军事力量的目标背道而驰。无论孩子们对环境的迅速适应是与美国家庭的孩子共同生活的结果，还是出于容闳对西学的强调，结果是他们都已经变得十分“西化”，而这正是当时的朝廷最害怕的事情。^③

同样的，素有中学修养的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嘉善）虽然置身美国，但对影响留学生思想观念变化的美国教育环境概然无知，不理解不容忍留学生身心上所发生的变化，而统统视之为“流弊”、“恶习”或“离经叛道”，最后因恐惧将来对留学生日趋西化的事实可能承担责任，而宁愿同意裁撤出洋肄业局，中

① 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梁碧莹：《陈兰彬和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221页。

③ 参见〔美〕史黛西·比勒著，张艳译，张猛校订：《中国留美学生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页。

止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计划。这种简单粗暴而又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既是陈兰彬、吴子登等个人性格驱使的结果，又是晚清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态发展的必然。

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其实并无根本性的矛盾，更无利益方面的冲突，只是他们身处中西文化交织的环境之中，却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自然显得无所适从；在不得不面对现实时，对他人和自己又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同情。相对说来，容闳比陈兰彬更相信西学是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在心理上偏爱于西方近代的科技和人文；而陈兰彬始终对中国文化保持强烈的自信，固执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情感上更倾向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他与容闳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是权力和职责之争，而是文化心理和个性殊异所致。